

沉思的老树的精灵

黄子平 / 著

新 / 人 / 文 / 论

纪念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沉思的老树的精灵

黄子平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沉思的老树的精灵 / 黄子平著. —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9
(新人文论丛书目)
ISBN 978-7-5675-2544-3

I. ① 沉… II. ① 黄… III. ① 文艺评论—中国—当代
IV. ①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19252 号



著 者 黄子平
总 策 划 李庆西 黄育海
项目编辑 许 静 陈 斌
封面设计 高静芳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兼传真)
门市 (邮购) 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刷者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32 开
印 张 11.75
字 数 248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2544-3/I · 1251
定 价 45.00 元

出版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再版序言

李庆西 黄育海

许多年以后，我们才意识到，一九八四年冬天在杭州举行的小范围座谈会给中国文学发展带来何等重要意义。许多人把那次座谈会称作“杭州会议”，陈思和教授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也专门提到了那次会议。其实它有一个更正式的名称，叫做“新时期文学创新座谈会”。现在看来“创新”这个字眼似乎平淡无奇，可是在当时的语境中却有着相当实际的理论指向，也即如何突破带有历史主义框架的“工具论”的神道设教。

会议的三位主要策划人茹志鹃、李子云、周介人，时为上海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负责人，他们之所以选择在杭州举办会议，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浙江的作家和出版单位对文学新思潮开始有了深度介入。当时我们二人是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年轻编辑，评论界正在发生的变革引起我们极大兴趣，本社刚刚出版了青年学子许子东的《郁达夫新论》，我们亦将目光投向上海另外两位青年评论家吴亮和程德培。我们开始意识到，那些具有颠覆性的话语方式将整个儿地改变文坛面貌。于是，出版一套“新人文论”丛书的构想渐渐浮现

在我们脑子里。在八十年代中期，京沪以外的地方出版社能够接触的作者资源还相当有限，正当我们苦于书稿难觅之际，在家门口召开的“杭州会议”不啻送来一个极好的机会。

作为会议合办方浙江文艺出版社（另一合办单位是杭州市文联）参会人员，我们全程聆听了会议座谈，有幸见证了那场叙事话语革命的头脑风暴。也许，寻根文学发轫，先锋小说崛起，都可以追溯到当日的讨论。毋庸置疑，那是八十年代最重要的文学聚会之一。当然对我们来说，一项实际的收获就是结识了众多思想敏锐的作家和评论家，使我们构想中的“新人文论”丛书有了明确目标。记得参加会议的有三十余人，其中作家有茹志鹃、李陀、郑万隆、阿城、陈建功、韩少功、陈村、李杭育等十几位，而评论家阵容亦颇耀眼，有李子云、徐俊西、周介人、鲁枢元、黄子平、程德培、蔡翔、许子东、陈思和、吴亮、季红真、南帆等人。我们的组稿对象是那几年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评论家们，后来进入“新人文论”阵容的作者差不多有一半都在那次会上。在“新人文论”之外，我们还趁势组约了作家韩少功的一本文论集。会议空隙中的几番忙碌，使我们这套丛书俨然有了像样的规模。

“新人文论”丛书融合了文学批评、文学史与理论探讨几方面内容，对象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包括“新时期文学”）。在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陈思和提出“中国新文学整体观”概念之前，我们这套丛书的基本构架已经按照打通现当代的思路来做了（九十年代以前，现代与当代文学尚分属不同学科），这是我们后来感到颇为得意的一点。其实，并非因为我们亦同样具有与那些研究者相似的学术眼光，而是当时的理论语境

给予我们这样的启示，我们感受到的批评与研究潮流本身就是重新寻找现代性的一个“有机的整体”。当然，这项工作具体做起来自有分工，当时我们二人兴趣更多集中在与当代文学相关的理论问题，丛书中侧重现代文学的几种，大多是我们尊敬的前辈编辑铁流先生的劳绩。

自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九年，间，“新人文论”丛书先后出版了以下十七种：吴亮《文学的选择》、程德培《小说家的世界》、许子东《郁达夫新论》（增订版收入丛书）、季红真《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周政保《小说与诗的艺术》、刘纳《论“五四”新文学》、黄子平《沉思的老树的精灵》、南帆《理解与感悟》、赵园《论小说十家》、李黎《诗与美》、蔡翔《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王富仁《先驱者的形象》、陈平原《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殷国明《艺术形式不仅仅是形式》、蓝棣之《正统的与异端的》、王晓明《所罗门的瓶子》、李劫《个性·自我·创造》。本来计划中还有陈思和一种，后来因故搁浅，一直是我们十分遗憾的事情。

概而言之，这套丛书是八十年代初开始活跃于文坛的青年学者和批评家的一次集体亮相，映照三十年前文学观念嬗变的思想大潮。我们至今认为，近世以来在中国人撰写的文论著作和批评文章中，此前尚未有过这样的精神视野和理论探索之勇气。因而，这套丛书的出版，对于文艺学研究，对于当代创作乃至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研究，都有着持续而深远的影响，随着时间推移愈显其原创文本的经典性。

现在看来，这套丛书也许尚有某些不足，当时作为“新人”的作者大多处于学术起步阶段，日后他们对自己的学术观点乃至整个

研究路径可能有过重大调整，甚至亦难免“悔其少作”的自谦心态。然而，已经成为文学史记忆中的这套丛书，如今仍然以其原初的文学理想昭示着可贵的探索精神。三十年过去了，当日的种种话题有些已经成为理论共识，有些则布下了日后形成学术歧见的“草蛇灰线”。当文学乃至人文精神式微之后，重读当年“新人”之作，自有“温故而知新”的精神感悟。我们认为，“新人文论”之重要性大抵可归纳为这样三点：

一、首先是理论突破性。丛书作者突破了将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思想禁锢，关注人性和人的精神世界，确立了文学的主体价值。在努力探寻艺术规律的同时，引入其他人文学科理论因子，改变了以往文学批评的单一话语方式，并将研究目光导向文化 / 文明范畴。

二、新一代评论家和研究者的成功崛起，是八十年代思想解放在文学领域的标志性事件。这个新的群体势必带来一种多元化局面，打破了长期以来科层化的文艺研究部门的政策性垄断。这些作者将个性化思维代入五四新文学以来累积的问题意识，亦改变了旧有的创作研究格局，昭示着体制性文艺学开始走向瓦解。

三、印证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时代风气。这套丛书有十三种是作者出版的第一本书（仅王富仁、赵园、王晓明、李劫四种为作者第二本书）。经历了三十年岁月磨砺，当初的“新人”如今绝大多数成为国内评论界和学术界的领军人物。其实，绝非编辑者有多么高明的人才眼光和学术前瞻性，八十年代绝对不像现在这样崇拜权威与名家，那是人文领域难得的容纳创造性思维的年代。

鉴于上述认识，我们觉得有必要重新出版“新人文论”丛书，

不仅是一种纪念，亦是为着赓续三十年前的创造——三十年前的一九八四年，难道不是仍给我们留着思想的门缝？一九八四，在乔治·奥威尔的书写中是思想禁锢的标识，而在我们的记忆中却是某种自由叙事的开端。

遗憾的是，由于时间与技术原因，这次再版未能联系到初版十七种的全部作者，其中周政保、李黎、李劫三种只能暂付阙如。另外让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原先因故未出的陈思和一种，终于能够得以补入。因而，这次再版的“新人文论”丛书是十五种。再版的各书除个别有所增补之外，我们只订正了文字舛误，另外由作者本人加写了一篇再版后记，其他一概按初版原貌刊印。

丛书再版得到十五位作者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热忱支持，以使我们的想法再度得以实施，所以在此附记一笔，以申谢悃。其他要感谢的人士很多，不能一一具述。

二〇一四年九月记

并非遥远的期待

——序

谢冕

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重大的文学时代。经历了长期的曲折之后，文学正在进入更新生命的蜕变期。当代文学纷繁变化的事实，令我们目眩。我们承受着它的“胎动”所带来的惊喜。纷至沓来的无视传统艺术规范（这种规范化的事业我们已有效地进行了数十年之久）的艺术创新，在我们面前展开了新、奇、怪的特殊文学景观。我们的喜悦之情是我们的前人所不曾有的，我们为此充满了幸福感。这种幸福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能获得的。与此类似的场面也许要追寻到二十世纪最初那一二十年的新旧两种文化的特殊激烈论争并最后导致变革的伟大时代。但我们也理所当然地承担了一份苦难，我们经历着无休止的因文学的蜕变而带来的不同观念、不同思维方式的冲撞与折磨，我们不得不以充分的耐心承受着历史的重负所给予的无尽的磨难。

但与二十世纪末叶展开的这场文学创作上划时代的变革性冲击相比，我们的理论批评显然要沉寂得多。理论未曾如同我们的“五四”前辈那样以勇猛的姿态为文学新潮呐喊着开辟前进的道路。

我们感到了某种匮乏。现实的理论批评界缺少那种立志于勇猛冲杀哪怕是有些偏激所带来的旋风式的呼啸。因此我们充满了期待。我们期待与文学创作的水准大体相称的文学批评，期待一种摆脱了对于非艺术因素的依附从而恢复了艺术良知的批评。这种批评不以一人一事的精致诠释为它的极致，而以建立于深厚的历史意识的显示文学大的走向的预测和判断来体现它的优势。这个工作需要整整几代人的争取。因为趋于凝固的思维模式给文学批评所造成的惰性力量是相当强硬的，它受到某种氛围的鼓励，因此，它的根本性变革将是一种长久的期待。

但“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北岛），文学的整个的跃动的环境不能不带给文学批评以新的冲动。一些没有受到太深批评惰性影响的批评力量，正在以无拘束的态度闯入了这个近于沉寂的园地。黄子平这样判定他的文学批评的观念：“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自我表现，是自我的一种存在方式”，“文学批评尤其需要创造性，创造性靠一种无拘束的自由心态”（《我与批评》）。这本身便是一种巨大的反拨，一种挣脱了禁锢之后的宣告。批评曾经只是某种附庸，批评的缺乏主体意识曾经是普遍的现实。不仅黄子平，他的许多同时代人，都对批评的某些业已僵化的模式观念表现了轻蔑。他们对自己的使命怀有充分的神圣感，他们无视那些要理论批评屈从于自己的非艺术的偏见与积习，而各自实践着自己的使命。单从这一点看，便可发觉理论自身孕育着何等惊人的内在活力。

黄子平不止一次地谈到张承志“老桥”这一意象给他的启发。他不仅把中年一代的评论家的任务归结为桥的使命，而且把自己的

命运归结为一块“桥板”。王光明在介绍黄子平的理论追求时对此有过评论。他肯定黄子平的文学批评活动把当代文学的具体材料放置于整个文学发展史的宏大背景中考察，即他认为的“坚守理论观照与历史观照的有机配合”（《他说自己是一块“桥板”》，《文艺报》453期）。但王光明又感慨他“那种浓重的老桥意识，是不是产生得太早了一些呢”？这正是黄子平批评意识中的富有魅力之处。像他这样冷静地把自己和别人清醒地放置于历史的大趋势中以考察各自的价值，并对自己的恰当位置作出判断的人并不多。这种价值判断，不是短浅的和近视的，它建立于一种深邃的思考，即对于文学发展的相当宏阔的希望之上。黄子平深知要达到那样一种境界，需要有人前赴后继地作出牺牲。桥和桥板，乃至他在一次座谈会上谈到的“先锋的倒下”，都透露出了某种悲凉感，但他无疑清楚地意识到，不付出代价而换取文学的进步，这完全是不可能的。那么，黄子平文学观念中的这种悲凉，不正是他对中国文学的渊源及其历史经验认识的深刻所在么？过早到来的“老桥意识”，说明中国文学更迭的快速，说明一代人的早熟，或许这正是我们所期待的。

令人欣然的是王光明的慨叹乃是一种过虑。在包括王光明本人在内的一代人的早熟中——他们过早地，甚至与他们的阅历、年龄不甚相称的忧患感，并不说明他们的落寞与颓唐。事情完全相反。他们是在进取途中，了解了中国历史的浓重惰性从而激发出更为韧性的坚持与更为清醒的争取，他们期望甚高，于是他们并不以他们眼前的成就作为终极。他们觉得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大迈进中，他们不过是一个过渡。他们期待的是更为壮丽的文学发展的事实呈

现。这就说明，不仅仅是骤跑速度的惊人，而且标示出的跨越的高度也是惊人的。我们所期待的与我们所达到的，超出了我们预定的范围。在考虑了我们眼前出现的这一新的文学梯队的现实之后，我们充满了信赖感与信心感。

不论是作为一座桥，或是谨慎地称之为“一块桥板”，其所指绝非是磨得发光的圆润和“全面”的平和。剖析黄子平的文学评论观念，他所有思考、论证和判断都充满了基于深刻的历史反思萌发的批判精神。黄子平有时追求幽默，但他的不擅长的诙谐感却透出批判的尖刻，他的批判性经过了思考的过滤；它的深刻性几乎是以“不容讨论”的方式出现的。他的文风与其说是诙谐，毋宁说是严峻（尽管他追求轻松，但历史的沉重负荷却使他轻松不起来），打动人心的正是这种严峻的沉重。我们从这种沉重中认识到他的早熟的文学性格。他从吴亮的两篇著作中，概括出一个令人震惊的命题：“深刻的片面”。在这篇“评论的评论”中，黄子平以不加掩饰的景仰，征引了新文学运动的前辈陈独秀、钱玄同、鲁迅、胡适等面对旧文学的坚强堡垒所发出的愤世嫉俗的呼喊。他认识到，处于“五四”那样的大时代，“一切面面俱到的‘持平之论’只能有利于保守僵化的一面，只有那片面的、不成熟的观点，却代表了生机勃勃推动历史的深刻力量”。他的这种惊世骇俗的宣告是基于文学实际的启示，他深深觉察到了传统文化因素的顽强，刻意以立论的“片面”打破那万古不移的平衡和稳定。

他在作真诚的期待：期待中国现今评论家卸下一种“思想重负”，打破一种定型的观念，即“他所代表的总是一个万无一失的思想体系”，“他所下的每一个判断都总是关于真理的声誉”。在另

一篇文章中，他更以十分果断的语气阐发了上述的观点：“对于整个理论进程来讲，不成熟是绝对的，成熟是相对的。历史已经证明，就中国的文学理论及评论现状而言，可怕的不是‘不成熟’和片面性（只要此一片面正常地得到彼一片面或众多片面的补充驳诘），而是那个过分成熟的、驾凌万物之上的唯一正确的成熟。”（《通往不成熟的道路》）他的这些言论，表现了他并不令人担心的一代青年勇猛的文学思考。黄子平没有要求别人走向他那怀有极大警惕的“成熟”——那种在中国传统文化性格中被铸造得圆润精滑、玲珑剔透的“成熟”，令人可怕的八面圆通的“成熟”。他自己也以他的有锋芒的，甚至带着天真的炽热的冲撞进入文坛。黄子平的这种早熟的关于“不成熟”的呼吁，正表现了他对中国文化“深渊”的熟悉和理解。所有的疑惧和警惕，均产生于这个理解之中。要是说他是一块桥板，则这块桥板的木质是与腐朽无缘的。在通往文学彼岸的途中，这一代人所展现的无负自己世纪的精神是鲜明的。

黄子平以他的大学毕业论文《从云到火》开始了他独特的文学批评活动。也许这篇论文充分的概括能力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但最为动人的还是他对于公刘诗中那一团火的发现和向往。从那时起，这位青年评论家便以包裹着一团烈火的冷峻的批评风格出现在人们面前：“这是火。不是那呼呼作响的跳动的火，不是那种耀眼的闪亮的火，而是一种不动声色地散发热力的火，甚至是一种以冷峻的外表包裹着的火。”（《从云到火》）黄子平把握这位诗人从云到火的创作历程的准确性，在于他一开始就把艺术的思考和关于人民命运的思考联系在一起，在他的艺术评论中跃动着对于时代和人民命运的关切，他能够把这种严重的关切包容在并不激烈的语言形式中。

他追求的是实质，而不是表面的效果。犹如他论述的“如云的火和如火的云”，他能够精到地以冷峻的外表包裹着火。黄子平的批评艺术个性一下子就得到显示。他能够以与他的年龄并不相称的成熟体现出他以激情装裹的充满进取精神的“不成熟”。

文学批评在现阶段的前进，体现在批评家多少意识到改变那种固定的单向的价值判断为多面的综合的价值判断的必要性。文学批评的层次感开始以异常丰富和繁复的姿态出现。黄子平说过：“真正的艺术品大概总是多层次、多结构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由此可以推及：有价值的对于艺术品的评论，也应当如此。在对于文学批评的繁荣的争取中，黄子平的批评活动不仅是严谨的（在同辈人中，他似乎比谁在下笔时都更为矜持。他的思路活跃、宏阔与他的吝于笔墨谨慎为文似乎构成了一种背反），而且也是丰富的。他总是在他涉及的范围内寻找尖新的命题，出乎意料而又引人注目地开掘着批评的新范畴。如他很早就关注于诗歌的时空意识的研究；在短篇小说的研究中，他从“结构—功能”的角度作了新的开拓；近年来他更致力于文学语言学的研讨；他的力作《同是天涯沦落人》更是以对于一个叙事模式的抽样分析的方法为审美批评开了一个新生面。黄子平对于各个作家作品的微观研究，作家如对林斤澜的创作的综合考察；作品如对《绿化树》、《你别无选择》等所发表的见解，都以体现了作者独到见解的睿智与深刻给人以印象。

黄子平的批评是杜绝了陈词滥调的（这在他是一个起点，但就是这一点，也表现了对于现有文学批评的极大超越），他力求以自己的语言，讲与作品实际紧密相连的自己对于艺术的领悟，这是黄子平此类批评的最坚实的基础。请读读他关于刘索拉那篇名

作的那篇评论。他随意地侃侃而谈，从人的自我选择，从历史规律不可超越的不存在无限可能性的无可选择，从贝多芬与巴赫的存在，谈到人总是在地球规定重力条件下跳舞，而人却总是对这样客观的不可移易的历史条件予以主观的解释：人们总是如此这般无休止地追问正常与失常，动机与效果，折磨着别人也折磨着自己。这才归到他要阐发的“正题”上来：“刘索拉戏谑揶揄而又不动声色，凝练集中而又淋漓尽致”，“人物几乎没有历史和过去，他们并不‘带着档案袋上场’。这里永远是现在时，永远像银幕上的映象用一束光把‘当前’呈示在你面前。”读到这样的言辞，你会感到他对作品艺术特征的把握的准确，但这还只是在平和之中闪现他那高度概括的精到。及至读到：“我们的理论至今无法对这种形象化的抽象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而正是这种形象化的抽象，使小说通向嘲讽、通向诗和哲学。对话灵活地用来转换时空并勾勒出人物，每一个人都是主人公因而并没有一个专门的主人公。人物都有一个被夸张了的特征，因而你只记住了这个特征，而不再晓得‘性格立体感’为何物。”这才展示出这位青年批评家的对于传统理论“绵里藏针”的挑战意味。

对于固有的文学观念的怀疑，化入了这些行云流水般的叙述的“潜台词”之中。要是说这里有着某种刻意标明的“片面”，那也是并非不深刻的。我们当然可以从这些与我们习见不同的叙述方式和并不随俗的理论提倡中得到一些新异的感受和启发。但显示了他的文学批评的强大力度的还是他基于历史和现实的事实而阐发的、带有鲜明针对性的判断：“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把它看作人类主体创

造性的永恒赞美。我却宁可把它看作特定时空下，我们民族走向现代化、民主化进程中一代人‘情绪历史’的一个浓缩。”这是他对《你别无选择》所作的最后归纳。在别人那里可能是要绕了许多弯儿才庶几可以达到的目的，黄子平寥寥数言便射中了箭靶。

我们寄希望于青年批评家的显然比他们目前已达到的为多——尽管他们在这个领域已作出了令人羡慕的成绩。我们这种寄望基于我们已有的文学（特别是文学理论批评）曾经衰落的事实，更受到了一个开放的社会要求开放的文学的现实的鼓舞。以我们这样有着令人羡慕的悠久而丰富文化传统的民族，以我们的全体人民所经历的巨大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磨难，以我们如今正在争取的充满艰险的大事业，我们理应有一个引起世界重视的文化和文学的繁荣，我们理应有经得起时间考验，与我们的历史和现实相称的文学家和批评家。

一代人没有辜负时代寄予他们的厚望，他们为此作出了认真的努力。黄子平入研究生院不久发表了《当代文学中的宏观研究》，他宏观地考察了当代文学研究中具有实质意义的问题，提出了一个新鲜中肯的命题：它的“特长”也就是它的“特短”。这就是，当代文学的研究由于是当代人对于同时代文学的研究，时间的筛子对它来说表现为极大的吝啬。“他的近距离观察常常局限了他的视野或局限了他的判断所应有的‘超时间性’。他往往为激情的迸发牺牲了研究工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不可避免地带有同时代人共通的局限和偏见。”（《当代文学中的宏观研究》）这些论证依然体现了我们前面论及的他对于社会和文学问题的敏锐判断力，体现了他求实的科学学风，更重要的是，就是他尝试着以远距离的、“超时间性”的长镜头考察文学实际的开端。

这种考察的特点在于，他试图把他所掌握、涉及的“材料”都纳入他对中国的，乃至世界的文学的历史整体性思考中去。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当然断然地拒绝了以往习见的那种人为的支离破碎的“切割”，那种貌似注重实际实则近于瞎子摸象式的推理和分析。因为获得了纵深的历史感，他的批评风格呈现了青年人难得的那种老练精到的特点。从局部说，他很苛刻，甚至显得挑剔；从整体说，他又宽容和大度。当他把一个个具体的文学现象放置于宏阔的历史背景中考察，那种拘于一时一地的浅层次的好、坏的判断消失了，而表现了一种对于存在的合理性的理解。他提倡的宏观研究，以双向的立体思维打破了单向的平面思维模式，由于他把文学现象看作了多层次多结构的整体，要求在丰富的“历史储存”中接受并阐述全部新的文学信息，呈现在评论家面前便是一片超脱了以往那种拘于时事和气候而作出的某种判断的局限性。

黄子平发表于《文学评论》的《论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的艺术发展》是他对自己艺术批评主张的一个有力的实践。它不仅是美学的批评，而且还是历史的批评。那篇文章中一如往常，在对历史事实作出判断时，具体而又不流于琐屑；既尖锐又“平和”，表现出历史纵深感和理论穿透力。他的“超脱”具体材料而对一个时期的历史现象作出精约概括的能力，显示了他成熟的老练。黄子平所从事的是对于困扰我们甚久的目光窄狭的、甚而是非艺术的干扰的弃置。他呼吁一种对生动的由平面到立体、由平行到交错的艺术的历史过程的研究。他特别强调的这种研究必须是以“贴近艺术”的方式进行的。

他们的文学活动刚刚起步，他们有待于经受更艰难的考验，他